

紙上談兵——清代臺灣軍事史研究綜述

許 毓 良

壹、前 言

在現今臺灣史研究的領域中，軍事史的研究看似冷門。不過這並不代表它無研究的價值，相反地透過軍事的角度，正可以補強各領域不易發揮的論點。就以臺灣史分期中的清代研究為例，如果了解到清廷長期治臺力求穩定的用心，則會發現“軍事”不一定要訴諸武備，往往一道諭旨或政令即可達到數萬甲兵之效。從這個觀點再盱衡整個清代臺灣史的研究成果，則更會發現其實軍事史的研究一點都不冷門，因為早有許多專文曾觸及到這個主題。

從時序上看，該主題的研究大致以 1945 年為一分野。之前，日籍學者對於清代臺灣軍事史的研究，較偏向人事地物的調查或地方性史料的收集。之後，尤其是 1949 國府遷臺以後，伴隨而來的是大批清代官方檔案的移入，促使該議題的研究有了相當大的延續性。1960 年代臺灣史學界興起一股現代化討論的熱潮，其焦點多以清末自強運動為主。此時臺灣的軍事史以“海防”為題逐漸受到重視，當中例如：煤務、電線、鐵路、對外關係等，也陸續有專文發表。此外在同一時期，以各地方文獻委員會為主的人員，也開始對一些特定的題目進行研究，其中對舊地名及海岸線的考據頗具成果。

在 1970 年代，對於清代臺灣軍事史的研究仍繼承之前的累積，並再衍生出治臺政策、臺灣建省、條約開港、歷史人物等議題。然而迥異於

清末專題式的討論，此時出現以中國軍事史發展為中心的通論性著作。這種深入地研究法影響到後繼的學者，因為到了 1980 年代，也出現以臺灣為主的特定軍事史通論。再者，由於受到西方區域地理研究的影響，臺灣的學者也開始嘗試探討清代的聚落與防務的關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陸史學界的發展。尤以 1980 年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成立後，不少與臺灣相關的論文隨之發表；然礙於意識型態的侷限，論點都強調臺閩關係的源流。

在 1990 年代，拜臺灣史成為顯學與兩岸開放交流之賜，對於該議題的討論，又增添或重新研究如：帆船貿易、港口分佈、開山撫番、偷渡、移民、海盜等。加上正值大陸改革開放之際，“現代化”的問題投射到歷史研究，反而豐富了以往對於傳統自強運動的看法。所以像是福建水師、北洋艦隊、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淮系集團等議題，又受到重新的詮釋。

因此從 1945 年以來的半個多世紀研究成果來看，針對清代臺灣軍事史的討論有幾個特點：其一，相關外文的論著極少。這一點不論從與臺灣史研究較為密切的英、日文著作來看均是如此。其二，大陸學者在討論這個主題時，習慣以清史或中國近代史的框架來處理，這等同於把該議題的研究納入中國史的範圍。其三，不同於大陸學者以時間斷限做為研究的取向，臺灣學者較偏向空間的思考——以臺灣島為中心，藉由像是縣廳級檔案、地方志、古文書等地方性史料，來討論某一時段島上人事物的發展。本文即在此基礎上，以總論(界說的問題)、戰爭史、聚落史、交通史、社會史、政治史(清末自強運動)的關係，對之前的研究成果做一回顧。

貳、清代臺灣軍事史界說的問題

清廷治理臺灣二百一十餘年(1684-1895)，軍隊的控制自然是促成長期統治的重要原因。不過當時軍隊的組成卻相當複雜，因為除了綠營、

勇營、番屯等官方武力之外，亦有團練、會黨等民間武力。因此所謂的軍事，若把它定義為“武力”，應該會比“武備”狹義地認知還易於解釋。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界定臺灣防禦的類別上。由於臺灣是一個海島，沿海守備是整體防禦的重要一環。但到了清末因開港而設立的海關與內地引進的釐卡，卻在防範走私、偷渡的功能上取代了日漸沒落的汛塘。所以很難從軍制上說明一切，倒不如從民變、械鬥、海盜、強梁、會黨、偷渡、走私、列強等防禦對象反推，如此還來的容易了解清代臺灣軍事的運作。以下的內容即是透過通論、防禦型態(海/陸)、政策、人物等研究成果的分類來敘述。

在通論方面，1970年代即有二本涉及清代臺灣軍事史的著作出版：一為包遵彭所著的《中國海軍史》，另一為羅玉東的《中國釐金史》。不過這二本書中關係到臺灣的篇幅並不多，充其量只是讓讀者了解其背景知識。¹直到1980年代，才有學者對於該議題做深入地研究，並有集大成的作品出現；許雪姬女士與她的力作——《清代臺灣的綠營》，則是堪稱最具有代表性。該書之所以重要，原因在於它是第一本大量運用台北故宮所藏前清檔案，再配合部分地方史料所完成的一部專著。以內容而言，除了在時間斷限上完整敘述整個清代臺灣的武備情形外，更以清廷治臺不同於內地的政策，來討論福建臺灣總兵官、臺灣班兵制度、綠營中的臺灣兵等特殊性的。²而在同時期，亦有趙淑敏所著《中國海關史》的出版，不過跟之前包、羅的角度一樣，僅提供臺灣海關背景知識的參考。³到了1980、90年代，也是以研究清代軍事史而頗負盛名的大陸學者羅爾綱，把多年來的研究成果編纂成《綠營兵志》、《晚清兵志》二書出版。前書為總覽，後書共分四卷，但以第一、二卷的淮軍志與海軍志跟臺灣比較有關。⁴另外大陸駐閩海軍軍事編纂室也完成《福建海防史》一書。

¹ 包遵彭，《中國海軍史》(台北：台灣書局，1970年5月)；羅玉東，《中國釐金史》(臺北：學生書局，1970年10月)。

²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7年5月)。

³ 趙淑敏，《中國海關史》(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2年11月)。

⁴ 羅爾綱，《綠營兵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6月)；羅爾綱，《晚清兵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考其書中內容雖遠溯先秦直指現代，但對於清代臺灣的軍事問題不過泛泛之談。⁵筆者也在這個階段完成碩士論文〈清代臺灣的海防〉，主旨在於從“以陸制海”的觀點，討論清廷經營臺灣海防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並說明其無法發展海權的原因。⁶

在防禦型態方面，清代海、陸二種截然不同的佈防，已成為後世學者討論的分類。對於前者，黃衡五的〈臺灣軍功道廠與府廠〉一文，算是少數利用《明清史料》而針對臺灣船政討論的佳作。⁷至於以水師為題的研究，則有王家儉與王御風的專文。前者也是長期在軍事史領域鑽研的學者，以往所討論的對象多偏向晚清的海防建設。王氏在1998年所發表的〈清代的綠營水師(1681-1853)〉，可以看得出其研究領域有再向前延伸的企圖。⁸後者則是以〈清代前期福建綠營水師的研究(1646-1795)〉為題撰寫的碩士論文。⁹然不管二者所討論的時間斷限有何不同，文章的主題多以內地水師的發展為主，反而對於海外一大重鎮的臺灣綠營水師刻劃不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本英文專著——J.L. Rawlinson 所著的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該書雖不全然著墨於臺灣的海防，但以中法戰爭做為全文論述的分期，事實上已把臺灣的戰略地位做了相當程度的表明。¹⁰

對於後者，李汝和對於單一主題——臺灣班兵的討論有不錯的成果¹¹；而同一議題，則以大陸學者季雲飛的研究較具代表。¹²與此同時，還有二

⁵ 駐閩海軍軍事室編，〈福建海防史〉（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4月）。

⁶ 許毓良，〈清代台灣的海防〉，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5月。

⁷ 黃衡五，〈臺灣軍功道廠與府廠(上)〉，《臺南文化》5.1(1959):10-18；黃衡五，〈臺灣軍功道廠與府廠(下)〉5.2(1959):75-85。

⁸ 王家儉，〈清代的綠營水師(1681-1853)〉，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等合辦，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1998年6月18-19日。

⁹ 王御風，〈清代前期福建綠營水師研究(1646-1795)〉，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1月。

¹⁰ John Lan Rawlinson, *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¹¹ 李汝和，〈清代駐臺班兵考〉（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5月）。

¹² 季雲飛，〈清代臺灣班兵制研究〉，《臺灣研究》，1996年，第4期，頁

位日籍學者一大谷敏夫、佐佐木寬，也各發表相關性質的文章。雖然他們的焦點不一定針對臺灣，但藉由財政、營制上的探討，仍可了解綠營的整體運作。¹³另外針對臺灣海關的專文也出現。學者葉振輝使用清末臺灣海關資料所做的研究，算是補白了這一段歷史的空缺。¹⁴而相似的議題大陸學者戴一峰也跟進，並在他的書中分析常關、海關，以及海關、釐卡扮演“守門”的角色與彼此在稅源上的競爭。¹⁵有趣的是在 1991 年，建築學者楊仁江在內政部的委託下，對於臺、澎地區的現存古砲做一普查，可說是在爬梳史料之餘，真正地做到實地考證的工作。¹⁶

在治臺政策方面，對於清廷的統治之道，向來史學界就分成消極、積極二種截然不同的看法。持前者意見的人，從日籍學者伊能嘉矩以降，多以時嚴時弛且左右不定的移民政策，批評清廷對臺統治採取消極的態度。該論調尤成為 1990 年以前的主流，或者流於清廷治臺的刻板印象。¹⁷不過大陸學者套用邊疆、海疆政策的觀點，以臺灣納入版圖後以府縣治之，而不以藩部治之的說法；或在重視西北陸疆，忽視東南海疆的前提下，強調所謂消極治臺不是海島一隅的特性。¹⁸而若干學者從開發史的角度，也部分修正了消極治臺說的主張。其中對於有無所謂“渡臺禁令”

63-68。

¹³ 大谷敏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た清代綠營軍制に関する一考察——特に營制・財政問題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史研究》34.3(1975):81-123；佐佐木寬，〈綠營軍と勇軍〉，《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紀念東洋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76 年 12 月），頁 345-358。

¹⁴ 葉振輝，〈清季臺灣開埠之研究〉（臺北：標準書局，1985 年 6 月）。

¹⁵ 戴一峰，〈近代中國海關與中國財政〉（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 年 4 月）。

¹⁶ 蘇文森，〈臺灣古砲普查大發現〉，《歷史月刊》，40(1991):64-65。

¹⁷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譯本·中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年 6 月），頁 409。張炎，〈清初治臺政策之檢討〉，《臺灣文獻》，21.1(1970):19-44；張炎憲，〈清代治臺政策之研究〉，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 年 6 月；張明雄，〈康熙年間清廷治臺政策及其檢討〉，《臺北文獻》，74(1985):41-85；黃秀政，〈清代治臺政策的再檢討：以渡臺禁令為例〉，《文史學報》，20(1990):49-66。

¹⁸ 馬汝珩、馬大正主編，〈清代的邊疆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 4 月）；何瑜，〈清代海疆政策思想探源〉，《清史研究》，1998.2:77-89。

或該令何時頒布的問題，則是從核心質疑該說的準確性。¹⁹除了前述的二種論點之外，亦有依分期的不同，運用歷史比較的觀點，說明清初、清中葉、清末治臺政策的不同。²⁰然值得一提的是對於“積極治臺”說，持肯定態度的還有美籍學者 J.R. Shepherd。Shepherd 為一人類學者，他透過在臺北三峽田野調查與史料互相配合的結果，提出清廷在對臺灣的戰略(strategy)、控制成本(control cost)、歲入潛力(revenue potential)皆經營得宜的狀況下，其統治一直是趨向“理性”。²¹

在人物的研究方面，對於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的研究可說是最熱門的主題。光復初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的“劉銘傳特輯專刊”算是首開風氣之先。²²不過該主題的研究熱潮，大約只持續到 1980 年代以前。²³而所探討的焦點，幾乎全圍繞在清末臺灣近代化的問題，並以建省、鐵路等較為人所重視。²⁴另外，王得祿與李鴻章又是另一個受人注意主題。

¹⁹ 楊 熙，〈清代臺灣：政策與社會變遷〉（臺北：天工書局，1983 年 5 月）；鄧孔昭，〈清政府禁止沿海人民偷渡臺灣和禁止赴臺者攜眷的政策及其對臺灣人口的影響〉，《臺灣研究十年》（臺北：博遠出版社，1991 年 11 月），頁 345-370。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史料運用問題——以清代渡臺禁令為例〉，臺灣師大歷史系等主辦，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民國 89 年 5 月 5-6 日。

²⁰ 彭賢林，〈林爽文事件後的清廷治臺措施〉，《臺灣文獻》，27.3(1976):183-199；黃秀政，〈論藍鼎元的積極治臺主張〉，《臺灣文獻》，28.2(1977):109-120；李國榮，〈論雍正時期對台灣的開發〉，《歷史檔案》，1992.4:94-98；湯熙勇，〈論清康熙時期的納臺爭議與臺灣的開發政策〉，《臺北文獻》，114(1995):25-53；鄧孔昭，〈清代前期關於台灣開發的一些不同主張〉，《台灣研究集刊》，1998.1:71-76；張世賢，〈清代治臺政策的發展〉，《臺灣史論叢》（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 年 4 月），第 1 輯，頁 221-237。

²¹ John Robert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²² 諸 家，〈文獻專刊(劉銘傳特輯)〉，4.1-2(1953)。

²³ 吳 玫，〈臺灣史學界對劉銘傳的研究〉，《臺灣研究集刊》，1985.3:100-101。

²⁴ 朱昌峻，〈劉銘傳與臺灣近代化〉，《臺北文獻》，6(1963):1-14；黃富三，〈劉銘傳與臺灣的近代化〉，《臺灣史論叢》（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0 年 4 月），第 1 輯，頁 273-279；陳延厚，〈劉銘傳與臺灣鐵路〉（臺北：臺灣鐵路管理局，1974 年 11 月）；蕭正勝，〈劉銘傳與臺灣建設〉（臺北：嘉新文教基金會，1974 年 6 月）；李友林，〈劉銘傳與臺灣防務〉，《臺灣研究》，1996.1:74-79；姚永森，〈劉銘傳傳——首任臺灣巡撫〉

前者為清代第一位臺籍提督，對於他的研究臺灣學者雖起步較早，但王的年譜編纂，卻是由大陸學者完成。²⁵後者的研究在中國近代史中可謂汗牛充棟，但關係到臺灣者，實際上僅是其中一小部分。這當中以 1874~95 年間李鴻章居於何種角色，最引起學者們的興趣。²⁶至於其他的人物研究，若按歷史時段區分，晚清與臺灣洋務有密切關係的一些疆吏較受到青睞。例如：沈葆楨、劉璈、邵友濂、岑毓英、吳光亮、胡傳、吳贊誠、楊昌濬、丁日昌、劉坤一等。²⁷對於一戰成名的英雄討論並不多，中法戰爭期間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甲午戰爭期間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的事蹟算是

(北京：時報出版社，1985 年 9 月)；王傳燾，《劉銘傳——臺灣現代化的推動者》(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0 年 10 月)。

²⁵ 陳漢光，〈王得祿傳記及其他〉，《臺灣文獻》，23.4(1972):33-56；王世慶，〈清代臺灣唯一水師提督王得祿〉，《臺灣文獻》，34.2(1983):43-49；徐明德，《清代水師名將——王得祿傳略與年譜》(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1 年 4 月)。

²⁶ 連文希，〈李鴻章與臺灣〉，《臺灣文獻》，23.2(1972):60-84；蔡學海，〈李鴻章與中日臺灣番社事件交涉〉，《臺灣文獻》，24.2(1973):14-29；陳在正，〈沈葆楨、李鴻章對 1874 年日軍侵台的態度〉，《台灣研究》，1988.1:72-76；馬騏，〈李鴻章與臺灣洋務新政〉，《臺灣研究》，1990.2:74-88。梁嘉彬，〈李鴻章與中日甲午戰爭(上)〉，《大陸雜誌》，51.4(1975):155-185；梁嘉彬，〈李鴻章與中日甲午戰爭(下)〉，《大陸雜誌》，51.5(1975):227-254。

²⁷ 魏永竹，〈沈葆楨對臺灣邁向現代化的影響〉，《臺灣文獻》，33.2(1982):103-109；王世慶，〈劉璈事蹟〉，《臺北文獻》，33(1975):89-100；林其泉，〈劉璈與中法戰爭臺灣保衛戰〉，《臺灣研究》，1988.2:69-74；鄧孔昭，〈試論台灣第二任巡撫邵友濂〉，《台灣研究集刊》，1985.3:29-38；許雪姬，〈邵友濂與臺灣的自強新政〉，《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8 年 4 月)，頁 425-460；張世賢，〈岑毓英治臺政績〉，《臺灣文獻》，28.1(1977):107-117；林文龍，〈清代開闢臺灣中路之吳光亮事略〉，《臺灣文獻》，26.3(1975):152-161；黃炫星，〈吳光亮與埔里社〉，《臺灣文獻》，32.4(1981):206-213；李小龍，〈胡傳與臺防〉，《臺北文物》，8.1(1959):19-25；張世賢，〈吳贊誠治臺政績〉，《臺灣文獻》，27.4(1976):96-102；吳玫，〈楊昌濬與臺灣建省〉，《台灣研究十年》(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1 年 11 月)，頁 441-460；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72 年 12 月)；季雲飛，〈丁日昌臺灣防務思想與實踐之探析〉，《臺灣研究》，1996.1:69-73；王玉棠，〈劉坤一評傳〉(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當中的幾篇。²⁸再者也有從歷史人物的戰略思想出發，進而討論他們對於當時臺灣防衛的影響；清初負責征臺的施琅、清末海防理論大師魏源是其中的代表。²⁹此外，亦有從臺灣防衛的大敵—海盜著手討論。康熙、嘉慶年間肆虐大陸東南海域的鄭盡心、蔡牽，自然是這個專題研究的主要對象。³⁰不過在這眾多本國人研究的專文中，最特別的還是出現對洋人的討論。1874 年牡丹社事件的要角—日軍的美籍顧問李仙德(Le Gendre 或譯為李善得、李讓禮)則是一個例子。而對於李氏的研究，除了在日治時期已有學者撰文過之外，1960 年代另有碩士論文以他為題發表。³¹

參、清代臺灣軍事史與戰爭史的關係

戰爭史的研究無疑是與軍事最具關係。臺灣本身位於四戰之地，因此歷史上的戰爭不少。關於此議題的研究，本文分成對內、對外二類戰爭來說明。在對內戰爭方面，島內層出不窮的民變與爆發的戰役，一直是重要的研究主題。例如：林爽文事件中諸戰役的始末，1950 年代於梨華曾利用《清實錄》與福康安後人所藏之《廷寄》做出整理。³²80 年代劉妮玲曾以該事件為題，對它的始末詳細敘述。³³筆者曾以港口的攻防為

²⁸ 許雪姬，〈抗法名將孫開華世蹟考〉，《臺灣文獻》，36.3-4(1985):239-256；李健兒，〈劉永福傳〉（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 年 6 月）；楊萬秀、吳志輝，〈劉永福評傳〉（商丘：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年 8 月）。

²⁹ 林其泉，〈施琅與清初治臺政策〉，《臺灣研究集刊》，1984.1:49-59；汪榮祖，〈施琅與臺灣〉，《臺灣研究》，1988.3:57-65；萬仲良，〈從施琅的奏疏中看他的海防觀念〉，《臺灣文獻》，33.1(1982):91-103；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臺北：大立出版社，1984 年 3 月）。

³⁰ 黃潘萬，〈剽竊海上之鄭盡心〉，《臺灣文獻》，14.1(1963):181-184；王世慶，〈蔡牽〉，《臺北文獻》，61-62(1983):1-19；季士家，〈蔡牽研究九題〉，《歷史檔案》，1992.1:93-101。

³¹ 庄司萬太郎著、賀嗣章譯，〈牡丹社之役與李善德之活躍〉，《臺灣文獻》，10.2(1959):65-77；黃純謙，〈李仙德與臺灣〉，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63 年 6 月。

³² 於梨華，〈林爽文革命研究〉，《文獻專刊》，4.3-4(1953):27-36。

³³ 劉妮玲，〈臺灣的社會動亂——林爽文事件〉（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

題，討論官軍與民變軍如何仰仗所佔港口的優勢，進行有效的攻擊或防禦。³⁴大陸學者陳孔立則從清廷作戰系統的僵化思考，評析數倍於敵的清廷軍隊仍無法在短時間中敕平亂事。³⁵然有別於前兩者從純軍事的角度，專長於經濟史的學者陳國棟，則從軍費籌措的角度出發，分析該事件對清廷在財政上的重大影響。³⁶至於其他對內戰爭的研究作品不多，同治朝所發生的戴潮春事件與光緒朝的施九緞事件，則是代表性的二篇。³⁷對於臺勇平亂的問題，許雪姬女士的撰文迄今仍是唯一的一篇。³⁸在漢番武力衝突的研究上，1980年代旅日學者張士陽，曾對雍正九、十年臺灣中部的平埔族叛亂，以“漢人壓迫”的觀點做過討論。³⁹清末的開山撫番戰爭，雖是整個清代臺灣漢番衝突的高潮，但直接研究的作品也不多，僅在90年中期出現相關的論文。⁴⁰比較少見的是對海盜追逐戰的描述，1970年代蘇同炳曾利用《清實錄》、《瀛洲筆談》等史料，對蔡牽做傳奇式的描寫。⁴¹

公司，1989年4月）。

³⁴ 許毓良，〈清代台灣民變中的港口攻防——以林爽文事件為例〉，《臺南文化》，48(2000):1-8。

³⁵ 陳孔立，〈林爽文起義與清朝作戰系統〉，《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年11月），頁154-172。

³⁶ 陳國棟，〈林爽文、莊大田之役清廷籌措軍費的辦法——清代一個非常時期財政措施的個例〉，《臺灣風物》，31.1(1981):5-16；陳國棟，〈林爽文、莊大田之役軍費的奏銷〉，《臺灣風物》，31.2(1981):55-65。

³⁷ 鍾華操，〈同治初年戴潮春之役〉，《臺灣文獻》，25.2(1974):52-71；黃福才，〈太平天國運動後期臺灣戴潮春起義〉，《廈門大學學報》，1981年增刊(史學專號):34-39；鄧孔昭，〈試論1888年台灣彰化施九緞起事〉，《廈門大學學報》，1981年增刊(史學專號):40-45。

³⁸ 許雪姬，〈林文察與臺勇——臺勇內調之初探〉，《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12月），頁299-333。

³⁹ [日]張士陽著、鄧孔昭譯，〈雍正九、十年台灣中部的原住民叛亂〉，《台灣研究集刊》，1991.2:72-84。

⁴⁰ 楊慶平，〈清末臺灣的「開山撫番」戰爭(1885-1895)〉，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6月。

⁴¹ 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上)〉，《臺灣文獻》，25.4(1974):1-24；蘇同炳，〈海盜蔡牽始末(下)〉，《臺灣文獻》，26.1(1975):1-16。

在對外戰爭方面，其研究的主題可謂全集中在列強叩關的戰爭上。⁴²道光二十年爆發的鴉片戰爭是臺灣與他們交鋒的第一次。是役臺灣軍民在道員姚瑩的帶領之下，連續在雞籠與大安海口誘敵成功各打了場勝仗。不過在隨後處理戰俘的過程中，卻犯了殺俘的大忌而獲罪。這一段史實之前常有隱諱或少爲人所知，直到 1950、60 年代才有學者探明。⁴³其次，同治十三年發生的牡丹社事件，又是一件臺灣受到列強武力入侵的大事。此事一度在北京引發海防與塞防、洋務派與保守派爭論的政治角力，對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不可謂不重要。但早期臺灣史學界對於它的研究，比較偏向日軍在恆春半島的軍事行動與清廷的善後措施。⁴⁴爾後該事件的研究稍微沉寂，但到了 1990 年代學者們又把焦點轉移到日軍侵臺的原因，以及對中日關係造成如何的互動等問題。⁴⁵

再次，光緒十年所爆發的中法戰爭，則是對清廷推動洋務數十年以來一次嚴酷的考驗。而在清代臺灣戰爭史的研究中，也是以它爲題所累積的成果最多。至於這場戰爭的二位主角—劉銘傳、劉璈，由於牽涉到湘、淮流派之爭，以及清軍防守戰略選擇的問題，更是聚焦所在。對於前者，許雪姬女士前後撰文二次，討論二劉之爭對於戰爭當時清軍內部

⁴² 陳在正，〈1840 年至 1870 年間歐美列強覬覦和侵略台灣的活動〉，《台灣研究集刊》，1992.2:61-68。

⁴³ 郭海鳴，〈英船犯臺與臺灣鎮道之冤獄〉，《臺灣文獻》，6.1(1955):7-13；廖漢臣，〈鴉片戰爭與臺灣疑獄〉，《臺灣文獻》，16.1(1965):24-52；季雲飛，〈道光帝與臺灣軍民的“抗英保臺”鬥爭〉，《臺灣研究》，1997.3:82-88。

⁴⁴ 謝汝詮，〈日寇侵凌牡丹社(一)〉，《臺灣省通志館館刊》，創刊號(1948):25-26；謝汝詮，〈日寇侵凌牡丹社(二)〉，1.2(1948):23-24；陳世慶，〈台灣牡丹社邊防始末(甲午前日本覬覦臺灣之一端)〉，《文獻專刊》，1.4(1950):28-42；林子候，〈牡丹社之役及其影響——同治十三年日軍侵臺始末〉，《臺灣文獻》，27.3(1955):33-58；G.H.卡爾著、吳玫譯，〈日本入侵臺灣的初期〉，《臺灣研究集刊》，1984.4:85-93。

⁴⁵ 藤井志津枝，〈近代中日關係史源起：1871-74 年臺灣事件〉(臺北：金禾出版社，1992 年 6 月)；戴寶村，〈帝國的入侵——牡丹社事件〉(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年)；徐國章，〈日本侵臺的思想緣起與占領臺灣〉，《臺灣文獻》，48.3(1997):65-100；孔凡嶺，〈1874 年日本出兵臺灣探析〉，《臺灣研究》，1997.2:61-64。

的影響。⁴⁶對於後者，基本上分成二派的看法：一認為劉銘傳當時從雞籠撤退，並馳援滬尾是戰略正確的決定。另一解釋為劉陷於流派之爭，雖冒著撤軍後雞籠有被敵佔領的危險，但也要退至滬尾保存實力。從多數學者撰文的意向來看，似乎均認同劉銘傳的抉擇⁴⁷；不過大陸近代史學者孔祥吉，根據新史料《樸園越議》一翁同龢輯錄醇親王奕譞寫給他的密信底稿，證實劉的撤退的確有出自保存淮系實力的打算。⁴⁸至於其他的文章則多從戰略、戰術的角度，評析中法戰爭對臺、閩防衛的測試與重建。⁴⁹最後是光緒二十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其實從戰史觀點而直接討論的文章並不多，但從戰爭緣由的敘述中，仍可以了解整個戰事發展的走向。

50

肆、清代臺灣軍事史與聚落史的關係

臺灣史學界對於與軍事相關的聚落史研究，可說從地理考證開始。1960年代學術圈中興起一股考證鄭成功登陸地點的熱潮，臺灣省文獻委

⁴⁶ 許雪姬，〈二劉之爭與晚清台灣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4(1983):127-161；許雪姬，〈劉璈與中法戰爭〉，《臺灣風物》，35.2(1985):1-28。

⁴⁷ 蕭正勝，〈劉銘傳與中法戰爭〉，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70年6月；胡志堅，〈中法滬尾之役〉，《臺灣文獻》，29.1(1978):151-158；戚其章，〈劉銘傳撤基援滬與滬尾大捷述論〉，《台灣研究集刊》，1992.2:53-60；梁義群，〈論劉銘傳抗法保臺最佳戰略戰術的選擇〉，《歷史檔案》，1997.4:110-116。

⁴⁸ 孔祥吉，〈是避敵自保還是高明戰略——劉銘傳撤守基隆新史料辨析〉，《清史研究》，1997.1:87-89。

⁴⁹ 王珂，〈中法戰爭與臺灣〉，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66年6月；蘇梅芳，〈同光年間臺灣海防與中法戰爭〉，《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一第八編自強運動(三)軍事》(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年8月)，頁641-679；韋慶遠，〈論1884-1885年反法侵略的臺灣保衛戰〉，《臺灣研究集刊》1984.1:1-17；吳玫，〈中法戰爭期間大陸對台灣的支持〉，《台灣研究集刊》1989.4:53-60。

⁵⁰ 陳漢光，〈甲午役中臺澎之防守與抗戰〉，《文獻專刊》，2.1-2(1951):18-26；梁華璜，〈甲午戰爭前日本併吞臺灣的醞釀及其動機〉，《臺灣文獻》，26.2(1975):103-115。

員會也適時銜命進行實地考察，並完成多篇調查報告。雖然他們的的研究都屬明鄭時期的範圍，但從學者們前後熱烈的參與來看，臺灣防禦的重心—港口已逐漸受到注意。⁵¹在所有臺灣港口的研究中，包括：清代嘉義縣海岸、沙馬磯、笨港、大安港、蚊港、國賽港、蜆港、洲仔尾、中港、後龍港等，均有專文做過討論。⁵²不過以整個臺灣港口發展史的歷程與成果累積來看，仍是以臺灣府城(臺南)、鹿港、淡水最為重要。

對於臺灣府城(臺南)的研究，多集中在鄰近港澳的變遷與城垣防禦的討論，並以學者范勝雄與石萬壽為代表。尤其是後者，長期針對這個主題進行研究而頗有成果。在他的調查之下，清楚地整理出清代各不同時期，對於府城城防不同程度的要求；包括汛塘的分佈、築城的時間、防禦工事的設立、兵民的協防、戰爭的考驗等。⁵³

對於鹿港的研究，在 1970 年代地方人士發起維護古蹟的運動中，有不少專文隨著這波社會動向以此為題。建築學者林會承以城鄉空間發展的概念，對所謂生活圈、各大姓的分佈、河港的聚落型態等對鹿港做深

⁵¹ 毛一波等，〈鄭成功登陸鹿耳門地點之研究〉，《臺灣文獻》，15.4(1964):63-92；許丙丁等，〈鹿耳門古港道里方位考〉，《臺灣風物》，11.9(1961):3-34；王丁巧，〈關於鹿耳門古港位置之我見〉，《臺灣風物》，11.9(1961):35-37。

⁵² 盧嘉興，〈嘉義縣屬海岸線演變考〉，《臺灣文獻》，10.3(1959):27-34；洪敏麟，〈古地名沙馬磯位置的調查報告書——關於沙馬磯古地名現在位置的探討〉，《臺灣文獻》，17.2(1966):48-72；洪敏麟，〈笨港之地理變遷〉，《臺灣文獻》，23.2(1972):1-42；王顯榮，〈大安港史話〉，《臺灣文獻》，29.1(1978):181-187；盧嘉興，〈蚊港與青峰關考〉，《臺南文化》，7.2(1961):110-122；盧嘉興，〈曾文溪與國賽港〉，《南瀛文獻》，8(1964):1-28；盧嘉興，〈臺南縣地志考——二層行溪與蜆港〉，《南瀛文獻》，10(1965):113-154；曾吉連，〈洲仔尾今古談〉，《南瀛文獻》，24(1979):36-38；林玉茹，〈清代臺灣中港與後龍港港口市鎮之發展與比較〉，《臺北文獻》，111(1995):59-107。

⁵³ 范勝雄，〈談臺灣府城垣〉，《臺灣文獻》，28.3(1977):49-54；范勝雄，〈談臺灣府城形勢〉，《臺灣文獻》，29.4(1978):239-251；石萬壽，〈臺灣府城的城防〉，《臺灣文獻》，30.4(1979):140-166；石萬壽，〈營兵與臺灣防務——以臺南府城為中心(上)〉，《臺灣風物》，35.1(1985):33-76；石萬壽，〈營兵與臺灣防務——以臺南府城為中心(下)〉，《臺灣風物》，35.2(1985):29-72。

入地探討。⁵⁴而不同於建築學的觀點，若從發展史的角度來看，研究者喜歡把鹿港當作中部的吞吐港，並以此為基礎討論郊商、海防、海運、移民等問題，或再擴大與臺灣其它港口做航運與商業機能的比較。⁵⁵然特殊的還是美籍學者 Donald R. DeGlopper 的論點。他的研究動機是以鹿港為例，反駁 Max Weber 認為“中國沒有城市社區(urban community)”的看法。文中除了提到該地複雜、區折的街道便於防禦之外，各大姓在鹿港的對立程度與福建相較則是和緩許多。雖然他們群居的考量之一是爲了械鬥時便於聚眾，但由於有不同的方法解決彼此的衝突，所以死亡人數相對減少；而運用“石戰”的儀式，則是該地不同於其它地方的特色。⁵⁶

對於淡水的研究，它的研究成果累積是這個專題最多的。⁵⁷不過早期的作品比較偏重追憶式的撰寫，除了從清代拉長時段至日治來敘說淡水的興衰之外，亦試圖把它與臺北盆地的發展做一連帶性質的討論。⁵⁸直接與軍事相關的研究，大致有砲台與海關二大主題。對於前者，臺灣史學者周宗賢對於清代在該處所設立的砲台，不管是舊式水師所用，或者是依西法所建的洋灰式砲台均有深刻地描述。⁵⁹對於後者，學者賴永詳與戴寶村均把焦點投注到清末—淡水依天津條約開港後的發展。也因此它帶來雙重的影響：一爲西方列強透過該管道，把勢力伸入了北臺灣。另一也是最重要的，臺灣在對外條約的規範下，該島的經濟也融入了以西方

⁵⁴ 林會承，《清末鹿港街鎮結構研究》（臺北：境與象出版社，1991年5月三版）。

⁵⁵ 張柄楠，〈鹿港開港史〉，《臺灣文獻》，19.1(1968):1-44；葉大沛，〈鹿港發展史〉（彰化：左羊出版社，1997年6月）；陳靜寬，〈清代鹿港的開發與發展〉，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6月；蔡采秀，〈海運發展與臺灣傳統港都的形成——以清代的鹿港為例〉，《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七)》（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9年3月），頁503-545。

⁵⁶ Donald R. DeGlopper, "Social Structure in a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ese Port City," In 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633-650.

⁵⁷ 張建隆，〈淡水史研究初探〉，《漢學研究通訊》，19.2(2000):178-187。

⁵⁸ 王榮峰，〈淡水港與台北〉，《臺北文物》，6.4(1958):87-89；姜道章，〈淡水之今昔〉，《臺灣文獻》，12.3(1961):111-141；盛清沂，〈說上淡水之內外港〉，《臺北文獻》，61-62(1983):135-152。

⁵⁹ 周宗賢，〈淡水與淡水砲台〉，《臺灣文獻》，41.1(1990):37-66。

世界爲首的資本主義市場中。⁶⁰

談到清末臺灣開港的問題，事實上從 1970 年代即有學者撰文探討，不過議題多關注在洋行對臺灣商業型態的改變。⁶¹這種對沿海港埠與臺灣開發相關聯的問題，引發了後繼者對臺灣港口全面研究的興趣。學者林玉茹爲該領域研究的代表。在她的努力之下，已整理出清代臺灣先後出現的近二百個港口，並依腹地、灣泊條件、吞吐量等的不同分級；同時再依史料的多寡，選定新竹縣做爲探討港口管理與地方人際互動的指標。

⁶²

至於在區性軍事佈署的討論上，曾經被列入研究的地區包括：北臺灣、南部二層行溪流域、清代舊鳳山縣境等。⁶³不過前述的文章僅從單純軍事角度來分析，真正與地方開拓史相結合，並再深入探討官方控制力對地方的影響性，還是以地理學者施添福的研究較具成果。⁶⁴當然對於以城池、關卡、衙署爲主題的撰文也有，但多偏向各別層次的敘述，還沒有出現對防禦工事全面性研究的論文。⁶⁵

⁶⁰ 賴永祥，〈淡水開港與設關始末〉，《臺灣風物》，26.2(1976):3-17；戴寶村，〈清季淡水開港之研究〉，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叢刊(臺北：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年)。

⁶¹ 林子候，〈四國天津條約與臺灣門戶之開放〉，《臺灣風物》，26.2(1976):25-30；林子候，〈臺灣開港後對外貿易的發展〉，《臺灣文獻》，27.4(1976):53-63。

⁶²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1996年12月)；林玉茹，〈清末新竹縣文口的經營——一個港口管理活動中人際脈絡的探討〉，《臺灣風物》，45.1(1995):63-117。

⁶³ 廖漢臣，〈清代北臺之設防〉，《臺北文物》，8.2(1960):22-29；石萬壽，〈二層行溪流域的軍防〉，《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86年12月)，頁231-275；許雪姬，〈清代鳳山縣的研究——清代綠旗兵在鳳山縣的防戍〉，《高雄文獻》，21-22(1985):65-151。

⁶⁴ 施添福，〈清代臺灣市街的文化與成長——行政、軍事和規模的相關分析(上)〉，《臺灣風物》，39.2(1989):1-41；施添福，〈清代臺灣市街的文化與成長——行政、軍事和規模的相關分析(中)〉，《臺灣風物》，40.1(1990):37-65。

⁶⁵ 尹章義，〈臺北築城考〉，《臺北文獻》，66(1983):1-22；許雪姬，〈媽宮城的研究〉，《澎湖開拓史學術研討會實錄》(澎湖：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89年1月)，頁27-49；詹德隆，〈清代噶瑪蘭之北關與南關初探〉，《臺北文獻》，95(1991):99-116；白長川，〈談南關與北方澳〉，《臺北

伍、清代臺灣軍事史與交通史的關係

臺灣爲一海島，在航空器還未發明以前，對外的交通均靠海運與大陸做聯繫。該島雖是東洋航路的一小站，且要到明代才爲中國海商廣泛注意；但由於被當作往來日本、琉球、呂宋的中繼站，因此自明中葉以後，它的戰略地位也逐漸爲人所重。對於這一段歷史的研究，學者張彬村長期耕耘顯得有成果。在他看來中國歷代統治者所持有的海貿思想，全然是政治、經濟利益互爲調合的結果；而在西方契約制度(contract system)未有效通行於東亞海域之前，中國海商的小規模經營方式反比西方殖民者還較佔優勢。⁶⁶針對海洋貿易史的討論，另一學者朱德蘭對於清初中日貿易的研究也頗有成就。⁶⁷臺灣在清廷對外貿易政策略爲鬆綁的過程中，自然是順著這一股潮流與大陸進行熱絡的交易。不過礙於官方對臺閩港口及航線的設限，事實上又涉及清廷欲以法令控管海貿而固海防的思想。廈門在清代長時期做爲與臺灣交流的港口，其重要性自不可言喻；陳國棟對於這個主題曾有深入的探討，並再擴大研究清中葉以前，臺閩的帆船貿易。⁶⁸但當多數人的焦點都投注在遠距離的海洋貿易時，學者許雪姬另闢專文討論竹筏在臺灣沿岸航行的問題亦顯得獨樹一格。⁶⁹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學者對該領域的研究，成果也相當豐碩。1980年

文獻》，97(1991):117-124；朱華興，〈艋舺水師參將署設置始末〉，《臺北文獻》，73(1985):173-183。

⁶⁶ 張彬村，〈十六-十八世紀中國海貿思想的演進〉，《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台北：中研院三研所，1986年12月)，頁39-57；張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紀華人在東亞水域的貿易優勢〉，《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88年12月)，頁345-368。

⁶⁷ 朱德蘭，〈清開海令後的中日長崎貿易商與國內沿岸貿易(1684-1722)〉，《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88年12月)，頁369-415。

⁶⁸ 陳國棟，〈清代中葉廈門的海上貿易(1727-1833)〉，《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四)》(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1年12月)，頁61-100；陳國棟，〈清代中葉(約1780-1860)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以船舶爲中心的數量估計〉，《台灣史研究》，1.1(1997):55-96。

⁶⁹ 許雪姬，〈竹筏在臺灣交通史上的地位〉，《臺灣風物》，33.3(1983):1-9。

代陳小沖與樊百川先後以“臺運”與輪船航運為題進行討論。⁷⁰隨後在大批學者投入的同時，該專題再分化成帆船、輪船二大子題。1990年代陳希育即以帆船為題，……對先秦以來中國的帆船貿易、造船業、船隻的規格做深入的描述。難得是該書所附有不少船譜圖、船隻結構圖，亦是作者花費心力整理出來。⁷¹在古代航海科技史的討論上，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著稱的學者章巽，曾帶領一個研究群對這個專題做出貢獻。在他們的努力下，不僅把先秦至明清以來的針路逐一釐清，諸多天文航海技術也以今日科學的方法重新解析。⁷²也是長於研究海洋史的學者楊國楨，以在福建搜集的道教科儀—《送彩科儀》，用來解讀清代閩南的航海技術，則是不同於傳統典籍爬梳之外的另一種解讀。⁷³對明末清初海上私人貿易研究也頗有成就的學者林仁川，亦曾撰文討論清初臺海兩岸的航運問題。⁷⁴至於對輪船的研究，近年來以辛元歐的成果較為顯著；而他把研究觸角伸入1949年以前，則是與之前的著作相比最不同的地方。⁷⁵

另外，還有日本學者松浦章的研究成果。松浦亦為海洋史的專家，在他研究的領域中，以〈清代福建的海船業〉、〈清代臺灣航運史初探〉二篇與本文的主題比較相關。⁷⁶其他特殊的專題還有海難的討論。其實臺灣海峽向稱難渡，這對以風帆為動力的船隻來說，則是在經商之外不得不考慮到的風險。再者，清末臺灣開港，外籍船隻一時接踵而至，不時

⁷⁰ 陳小沖，〈評台運〉，《福建論壇(文史哲版)》，1985.1:75；樊百川，〈中國輪船航運業的興起〉，1987年，四川版(影印本)。

⁷¹ 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年)。

⁷² 章巽主編，〈中國航海科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11月)。

⁷³ 楊國楨，〈航海送瘟神——由“送船科儀”看清代閩南航海〉，《歷史月刊》，94(1995):88-90。

⁷⁴ 林仁川，〈清前期海峽兩岸的通航及其影響〉，《史學集刊》，1994.1:17-24。

⁷⁵ 辛元歐，〈中國近代船舶工業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⁷⁶ 松浦章著、劉序楓譯，〈清代臺灣航運史初探〉，《臺北文獻》，125(1998):205-227；松浦章，〈清代福建的海船業〉，《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頁191-213。

發生的外國船難也常造成清廷對外交涉的困擾。⁷⁷

陸上交通與軍事的關係又是另一個主題。不過與該領域相關的著作卻很少。臺大研究生黃智偉以清代臺灣的“縱貫線”為題，分析出清廷對西部平原諸多道路的掌握，進而確立統治的基礎則是一篇代表性的作品。⁷⁸至於在古道方面，黃炫星踏勘清代臺灣各越嶺古道、吳永華調查蘇花古道、唐羽撰文討論淡蘭古道亦累積一些研究成果。⁷⁹

陸、清代臺灣軍事史與社會史的關係

清代臺灣是一個典型的移墾社會。漢移民來到這個島上拓墾，除了面對氣候、疾病所造成的水土不服之外，政府公權力不彰與多族群的衝突，也使得彼此必須擁有一定的武力以求自保。如此也造成一種現象——民間武力與官方武力形成一種時而對抗、時而收編的奇特情形；或甚至可以解釋成地方亂事的出現，亦是民間與官方武力失衡的結果。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歷年累積頗多，本文即以海盜、偷渡、民變、械鬥、會黨、鄉治、漢番衝突依次敘述。

在海盜方面，不同於戰爭史與人物的討論，該領域的研究比較偏向他們的組織、個人背景、日常生活等問題的陳述。因此所討論的對象未必是與臺灣較有關聯的福建海盜，不過由於清代東南海盜常有結盟、合

⁷⁷ 廖風德，〈海盜與海難：清代閩臺交通問題初探〉，《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88年12月)，頁191-213；劉縉紳，〈臺灣(沿海)外籍船難與燈塔之興建〉，《臺灣文獻》，42.3-4(1991):57-100；湯熙勇，〈清代台灣的外籍船難與救助〉，《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年3月)，頁547-583。

⁷⁸ 黃智偉，〈統治之道——清代臺灣的縱貫線〉，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6月。

⁷⁹ 黃炫星《臺灣的古道》(臺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91年9月)；吳永華，《蘇花古道宜蘭段調查研究報告》(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4年6月)；唐羽，〈古代噶瑪蘭與前山間交通道路之研究——1632-1810年〉，《「宜蘭研究」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12月)，頁184-232。

作的關係，所以亦有了解的必要。學者張中訓對閩浙海盜組織的研究，為一篇大量使用《明清史料》、《宮中檔》、《上諭檔方本》、《清實錄》、《瀛洲筆談》、地方志完成的佳作。在他的整理下包括：海盜主從互惠的關係、家族組織結構、鄉土地域觀念、民間宗教信仰、反清政治意識、財務經理運作、陸路的支援、小股私梟的串聯等，均在討論範圍之內。⁸⁰不同於張氏的思考，美籍學者 Dian H. Murray 則把焦點放在中國海盜與越南海盜的結盟關係，並認為清廷能夠勘平盜亂，除了運用武力追剿外，招撫作為一種手段也適時達到效果。⁸¹日本學者松浦章則著重討論明清海盜歷史“繼承”的問題。強調在地理環境、政府法令、人民生計等因素的搭配下，海盜不過是沿海百姓生活用糧的一種手段而已。⁸²

在偷渡方面，不同於前述界說問題所指稱，該領域的研究比較偏向偷渡對臺灣社會造成的衝擊。學者莊金德在 1960 年代從《明清史料》、《清實錄》爬梳所得，整理出清廷對臺灣六次嚴禁偷渡、一次嚴禁攜眷、三次疆吏建議允許人民攜眷、三次疆吏奏准允許人民搬眷的過程，強調清政府在應付持續不斷的偷渡潮時，中央與地方本身也持有開放、反制二種截然不同的看法。⁸³同樣的問題思考，吳樹利用清中葉對偷渡的司法判決，來詮釋清廷施政與現實脫節的窘境。⁸⁴師大研究生黃秀娟對於該專題的探討，則凸顯出偷渡對臺灣社會人口數量、人口結構、土地開墾、社會問題的影響。⁸⁵

在民變與械鬥方面，海峽兩岸各有一名學者對這二大專題長期耕耘。

⁸⁰ 張中訓，〈清嘉慶年間閩浙海盜組織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台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年12月），頁161-198。

⁸¹ [美]穆戴安(Dian H. Murray)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Pirates of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9月）。

⁸² 松浦章，〈明清時代的海盜〉，《清史研究》，1997.1:10-17。

⁸³ 莊金德，〈清初嚴禁沿海人民偷渡來臺始末(上)〉，《臺灣文獻》，15.3(1964):1-20；莊金德，〈清初嚴禁沿海人民偷渡來臺始末(下)〉，《臺灣文獻》，15.4(1964):40-62。

⁸⁴ 吳樹，〈道光年間偷渡一判例〉，《臺灣風物》，18.1(1968):41-44。

⁸⁵ 蔡秀娟，〈清代閩粵臺偷渡人口問題之研究〉，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1月。

臺灣學者張莢在 1960、70 年代發表不少專文探討。他整理清代臺灣檔案中涉及“謀逆”、“豎旗”的部分，反駁傳統對於臺灣民變發生，均歸咎於革命論、習尚說、吏治說等，而認為應分為政治性、社會性才符合實情。⁸⁶至於械鬥的討論，他則針對道光年間噶瑪蘭二起械鬥事件、光緒二年苗栗的吳阿來事件。⁸⁷大陸學者陳孔立在 1980 年代開始注意這個問題，同時也有許多作品發表。在民變的研究上，朱一貴、吳福生、林爽文、張丙事件是他關心的議題。不過礙於意識型態的框架，三者的思考都不脫“農民起義”的範圍。⁸⁸在械鬥的研究上，所討論的是乾隆三十三年游民暴動(黃教)、咸豐三年的頂下郊拚，以及清代臺灣分類械鬥的分析。然不管是對前述那個题目的討論，均從移民原鄉的角度出發，特重械鬥發生的時間、地點、何種類型來做細部分析。⁸⁹

至於其他研究者對於民變的討論上，1950 年代楊輝與李小龍針對朱一貴與吳齒甫、郭興的撰文，算是早期研究民變的文章。⁹⁰之後張雄潮提出政治、社會、地理等幾個特點，用來解釋清代臺灣民變迅起迅滅的原因。⁹¹1980、90 年代師大研究生劉妮玲與成大研究生李宜憲也以“清代臺灣的民變”為題進研究。前者先從民變的背景描述，之後對它們進行分類與個案分析，尤其著重民變參與者的社會角色。後者僅探討乾隆時期的臺灣民變，並把焦點鎖定在造成民變的民生、軍紀、吏紀等問題的探討。⁹²比較特殊的是同樣也為成大的研究生金智，以“社會動亂”為題，

⁸⁶ 張莢，〈臺灣反清事件的不同性質及其分類問題(上)〉，《臺灣文獻》，26.2(1975):83-102；張莢，〈臺灣反清事件的不同性質及其分類問題(下)〉，《臺灣文獻》，26.3(1975):4-13。

⁸⁷ 張莢，〈同籍械鬥的吳阿來事件〉，《臺灣文獻》，20.4(1969):118-136；張莢，〈宜蘭兩次械鬥事件之剖析〉，《臺灣文獻》，27.2(1976):54-71。

⁸⁸ 陳孔立，〈清代臺灣移民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 年 10 月)，頁 127-153；197-209。

⁸⁹ 同上註，頁 229-293。

⁹⁰ 楊輝，〈朱一貴革命史略考〉，《臺灣文獻》，10.4(1959):47-50；李小龍，〈雍乾間彰化兩起豎旗事件〉，《臺北文物》，9.1(1960):99-102。

⁹¹ 張雄潮，〈清代臺灣民變迭起迅滅的因素〉，《臺灣文獻》，15.4(1964):17-39。

⁹²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 6 月；李宜憲，〈清乾隆的臺灣民變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

把清代臺灣的民變與械鬥做綜合性的分析，但斷限僅止於嘉慶、道光二朝。⁹³

另外其他研究者對於械鬥的討論，以案發地方為主的描述並不多，可說均以歸納式的方法綜述。⁹⁴1970年代學者黃秀政、樊信源針對此議題提出個人的看法。前者認為從民間與官方對拓墾速度的歧異來解釋分類械鬥，應可以探求較完整的面貌。後者則力主以民間械鬥的字眼來代替分類械鬥，並認為該中性用法可以避免過分強調地域與族群的觀念。⁹⁵80年代還是研究生的學者林偉盛，不同樊氏的看法以“分類械鬥”為題撰寫碩士論文。林氏著重案發地點的空間描述，並以此為基礎對械鬥的發生、蔓延狀況、參與者做細部分析。⁹⁶同時期學者許文雄亦提出械鬥與“民眾起義”區分的看法，並認為性別比例的不均、結拜風氣鼎盛是重要因素。⁹⁷

在鄉治方面，1950年代司法學者戴炎輝開始整理清代淡水廳、新竹縣的檔案，並根據這批難得的史料研究清代臺灣的鄉治問題，包括：鄉治的組織、村庄與村庄廟、番社的組織、地方官制與運作、隘制及隘租、屯制與屯田等。戴氏的研究可以說完成該領域的奠基工作，之後所有對這些議題的討論大致都不脫此範圍。⁹⁸義民與團練可說是鄉治的基本武力，蓋因於兩者在平定民變與抵抗外敵時，常在兵源與餉源上支援官方的不足。對於義民的研究有丁光玲與謝宏武分別撰文探討，而彼此的不同在於前者著重各別民變中義民的表現，後者傾向從清廷與義民的利害

所碩士論文，1990年6月。

⁹³ 金智，〈清代嘉慶、道光朝臺灣社會動亂的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6月。

⁹⁴ 黃啓木，〈分類械鬥與艋舺〉，《臺北文物》，2.1(1953):55-58。

⁹⁵ 黃秀政，〈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事件之檢討〉，《臺灣文獻》，27.4(1976):78-86；樊信源，〈清代臺灣民間械鬥歷史之研究〉，文化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3年6月。

⁹⁶ 林偉盛，〈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之研究〉，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6月。

⁹⁷ [美]許文雄著，李祖基譯，〈清代台灣邊疆的社會組織與社會動亂〉，《台灣研究集刊》，1988.1:94-104。

⁹⁸ 戴炎輝，〈清代臺灣的鄉治〉（臺北：聯經出版社，1992年5月三刷）。

關係分析。⁹⁹針對臺灣團練研究的專文不多，臺大研究生林聖芬的碩士論文可以為代表。¹⁰⁰至於針對某一地域，討論駐軍與鄉治的互動關係，可參閱楊慶平以清代的宜蘭社會為例撰文討論。¹⁰¹

在漢番關係方面，該領域的研究以番屯的討論最為豐碩。番屯為乾隆五十三年清廷平定林爽文事件後，依欽差大臣福康安的建議仿四川屯番而設置。該部之所以重要在於綠營的武備之外，又收編平埔族的武力成為官方的武力，這在研究清代臺灣漢番關係(或衝突)時，常成為重要的解惑關鍵。而對於它的討論，早期有學者黃典權、莊金德、鄭喜夫曾撰文發表。¹⁰²近年來政大研究生謝仲修在前人的基礎上，再補充臺大圖書館所藏《岸裡大社文書》、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輯的清宮史料，對該議題有更深刻地描述。¹⁰³另外隘防的討論也是一個重點。隘的出現可說是漢人為防範原住民攻擊，而在山脈、丘陵險處建築的防禦工事。學者王世慶先生早在 1950 年代曾撰文探討過，但跟進的人不多；僅在 70 年代李紹盛重新討論過。¹⁰⁴

再者，該領域的其他議題還有對軍工匠的討論。所謂的軍工匠就是在臺灣的封禁政策下，仍可出入番界砍伐用以建造戰船的樟木，所形成的一群特殊團體。由於他們的匠寮分佈在海拔不等的山區，本身就是一個代表漢番利益與衝突的場所，因此了解他們也有助於釐清對當時的漢

⁹⁹ 丁光玲，〈清代臺灣義民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 9 月）；謝宏武，〈清代臺灣義民之研究〉，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6 月。

¹⁰⁰ 林聖芬，〈清代臺灣之團練制度〉，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5 年 6 月。

¹⁰¹ 楊慶平，〈清代的宜蘭駐軍與宜蘭社會〉，「宜蘭研究」第三屆學術討論會，1998 年 10 月 16-18 日。

¹⁰² 黃典權，〈林爽文事變中的四川屯番〉，《臺北文物》，6.3(1958):97-100；莊金德，〈台灣屯政之興廢〉，《臺灣文獻》，11.4(1960):33-107；鄭喜夫，〈清代臺灣「番屯」考(上)〉，《臺灣文獻》，27.2(1976):111-130；鄭喜夫，〈清代臺灣「番屯」考(下)〉，《臺灣文獻》，27.3(1976):。

¹⁰³ 謝仲修，〈清代臺灣屯丁制度的研究〉，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6 月。

¹⁰⁴ 王世慶，〈台灣隘制考〉，《臺灣文獻》，7.3-4(1956):7-25；李紹盛，〈臺灣的隘防制度〉，《臺灣文獻》，24.3(1973):184-201。

番互動。不過礙於相關史料奇缺，撰文的數目相對減少；學者陳國棟、程士毅在 90 年代的二篇文章可為代表。¹⁰⁵談到封禁的問題，清廷為有效阻絕漢移民拓墾速度超出控制的範圍，遂在全島山區附近，特別是鄰近生番地域立石為界或挑溝堆土。這種被稱為“土牛”或“土牛溝”的標記，則為探討漢番勢力消長或劃分的重要指標。對於它的研究，學者施添福在新竹地區長期耕耘頗有成果；¹⁰⁶近年臺大研究生王慧芬亦針對該主題，從清廷的政策面做全盤的檢討。¹⁰⁷而同樣對政策的研究，政大研究生楊燿鴻嘗試從清末的開山撫番，探討漢人、熟番、生番如何在這速變的大環境中尋求適應。¹⁰⁸

在會黨方面，大陸學術界對此有不錯的成果，並且也成立會黨史研究會專攻該領域。不過從累積的著作來看，其焦點多放在對天地會、洪門、小刀會等源流的考證。¹⁰⁹鄧孔昭與連立昌則是彼岸研究群中，比較不偏考證而注意會黨與社會依存關係的學者。前者從八卦會的發展來討論戴潮春事件，使得該問題的研究多增新的視野；¹¹⁰後者整理出歷代(北宋~民國)流傳在福建的秘密宗教與幫會，並討論他們生成的原因與相承性。¹¹¹臺灣學者對該議題的研究，以莊吉發先生的成果最具代表性。莊氏大量使用台北故宮的前清檔案，探討臺灣移墾社會中會黨形成的原因，並進而檢討清廷運用司法手段處理的得失。¹¹²

¹⁰⁵ 陳國棟，〈「軍工匠首」與清領時期臺灣的伐木問題 1683-1875〉，《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1(1995):123-158；程士毅，〈軍功匠人與臺灣中部的開發問題〉，《臺灣風物》，44.3(1994):13-49。

¹⁰⁶ 施添福，〈清代臺灣竹塹地區的土牛溝和區域發展〉，《臺灣風物》，40.4(1990):1-68。

¹⁰⁷ 王慧芬，〈清代臺灣的番界政策〉，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1月。

¹⁰⁸ 楊燿鴻，〈清末在臺民族政策研究(1875-1885)〉，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

¹⁰⁹ 可參閱郭成康主編，〈清代社會史論文索引〉，《清史研究》，1997.2:111-128。

¹¹⁰ 鄧孔昭，〈台灣八卦會和戴潮春起義〉，《台灣研究集刊》，1984.4:66-73。

¹¹¹ 連立昌，《福建秘密社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二版)。

¹¹² 莊吉發，《清代台灣會黨史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9年5月)。

柒、清末現代化研究下的臺灣軍事史

本文的最後一節其實僅探討一個主題——自強運動。咸豐十一年因總理各國事物衙門設立而展開的自強運動，可說是清廷對西方船堅砲利認知下的現代化運動。該領域的研究本屬政治史的範圍，但當中涉及許多軍事問題，因此絕對有另闢一節的必要。再者，該運動雖僅歷時短短的三十餘年（至光緒二十一年甲午戰敗結束），但史學界對它的討論，不論從學者的人數與作品的累積都相當可觀。本文在這基礎之上，以洋務、海防、艦隊、淮系集團、臺灣建省、對外關係為題分門敘述。

在洋務方面，主要的議題集中在清廷對西方“器物”層面的模仿。不過針對討論對象的不同，亦區分中國與臺灣兩大子題。對於前者，1960年代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們，運用《海防檔》、《清史稿》、清末名臣的奏議與遺集，分別以鐵路、輪船、兵工廠、電線為題進行研究。¹¹³70年代以後臺灣史學界對這些議題的討論稍嫌沉寂。¹¹⁴反倒是大陸史學界在80年代，因政治上的改革開放投射到該領域中，對於之前均以“封建”的批判性說法提出部分的修正。學者夏東元是其中的代表。他的所謂“發展論”即運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從經濟和人物史出發，對整個洋務運動的過程重新解讀。¹¹⁵對於後者，臺灣的煤務、鐵路比起內地顯得有成就；如此也引起學者從這二個子題，繼續做深入地討論。¹¹⁶1980年代臺大政治所研究生吳重義，以“清末臺灣洋務運動”為題跟進，算是這

¹¹³ 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年5月）；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6月）；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7月）；黃嘉謨，〈中國電線的創建〉，《大陸雜誌》，36.6-7(1967):171-187。

¹¹⁴ 曹永和，〈清季在臺灣之自強運動〉，《中華文化復興月刊》，8.12(1975):17-24。

¹¹⁵ 夏東元，〈洋務運動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

¹¹⁶ 黃嘉謨，〈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6月再版）；江慶林，〈臺灣鐵路史〉（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79年）；曾迺碩，〈清季臺北之鐵道〉，《臺北文物》，6.2(1957):135-150。

波研究浪潮末期的代表性著作。¹¹⁷

在海防方面，對於該領域的研究也分成二個子題；一為海防與塞防的討論，另一為臺灣海防的地位。對於前者學者姚欣安與劉石吉，嘗試從清末湘、淮系的政治角力來解釋，則是其中的代表¹¹⁸；但相較於歷史學者習慣追索人際脈絡，若從純軍事觀點來分析此問題，又會得到不同的結果。淡大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研究生賴進義，從清廷整個國防戰略體系來思考，則是該領域代表性的撰文。¹¹⁹至於學者王家儉從清末海防論的演變，來探究清廷在實務的處理也是獨樹一幟。¹²⁰對於後者，清末臺灣海防的代表性建築物，也是首座按西洋施工法所興建的砲台—億載金城，則成為討論的重點，1980年代末期，建築學者楊仁江主持該砲台的修護計劃，而為配合工程所需的考古挖掘、史料整理、報告撰寫也陸續展開。¹²¹另外亦有從清末臺灣與大陸的海防形勢來討論者。不過對該問題的探討多以泛論居多，僅在同一時期東海研究生謝紀康，以“清季臺灣海防經營”為題跟進，也算是這波研究浪潮末期的代表性著作。¹²²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學者耿雲志，利用臺灣游宦的書信——臺東州知州胡傳與著名的思想家邵作舟的通信，解讀清治末期臺灣官員與內地人士在

¹¹⁷ 吳重義，〈清末臺灣洋務運動之研究〉，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6月。

¹¹⁸ 姚欣安，〈海防與塞防的爭論〉，《中國近代史論叢——自強運動（第一輯第五冊）》（台北：正中書局，1956年），頁206-215；劉石吉，〈清季海防與塞防之爭的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八編自強運動（三）軍事》（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年8月），頁83-119。

¹¹⁹ 賴進義，〈晚清海防塞防之爭的研究（1874-1881）——國家戰略構想的解析〉，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12月。

¹²⁰ 王家儉，〈清季海防論〉，《師大學報》，12（1967）：139-179。

¹²¹ 臧振華、厲以壯，〈古砲台之謎——億載金城考古〉，《歷史月刊》，19（1989）：14-22；李乾朗，〈從億載金城的挖掘談起〉，《歷史月刊》，19（1989）：23-29；何培夫，〈億載金城之研究〉，《臺灣文獻》，41.2（1990）：9-61。

¹²² 張世賢，〈清代對於臺灣海防地位之認識〉，《臺灣文獻》，27.2（1976）：206-210；陳在正，〈1874-1875年清政府關於海防問題的大討論與對台灣地位的新認識〉，《台灣研究集刊》，1986.1：45-57；謝紀康，〈清季臺灣海防經營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6月。

海防觀念的歧異，則為一少見的作品。¹²³

在艦隊方面，晚清中國全力發展海軍卻以慘敗收場，其本身就是吸引史學界注意的問題。當然在這個領域中也細分出幾個子題出來。首先是對福建船政局的研究。1960年代學者瞿立鶴對福州船政學堂的研究為早期的專文。¹²⁴爾後學者張玉法利用《船政奏議》、《海防檔》、《福建通志·福州船政志》等史料，再做更細部的描述。¹²⁵80年代大陸學者楊東梁已注意到該船廠的建立，對中國近代海軍的發展產生何種程度的影響。¹²⁶90年代由於對該議題的研究已有基礎，因此大陸、香港的學者也各以“船政興衰”為思考，討論福建船政局與所屬艦隻的歷史定位。¹²⁷其次是對整個清末水面艦隻發展的檢討。這個議題的研究大陸學者已累積不錯的成果，諸如：戚其章、姜鳴等學者或研究群，均有代表性的著作問世。¹²⁸再次是對後勤探討的問題。該議題以臺灣學者包遵彭、王家儉的撰文為代表。前者則從清季的海軍經費入手，後者以清季的海軍衙門做為討論焦點。¹²⁹

在淮系集團方面，該領域的研究可說全是大陸學者的天下；而當今

¹²³ 耿雲志，〈讀邵作舟與胡傳論臺灣海防書〉，《甲午戰爭與近代中國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頁189-197。

¹²⁴ 瞿立鶴，〈福州船政學堂〉，《師大學報》，13(1968):255-265。

¹²⁵ 張玉法，〈福州船廠的開創及其初期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1971):177-225。

¹²⁶ 楊東梁，〈馬尾船政局在我國近代海軍發展史上的地位〉，《清史研究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8月），頁309-323。

¹²⁷ 楊東梁，《大清福建海軍的創建與覆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二刷）；葉國洪，〈清末自製現代化船艦理想的幻滅——福州船廠毀於中法戰爭〉，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等合辦，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1998年6月18-19日。

¹²⁸ 戚其章，《晚清海軍興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7月）；姜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12月）；近代中國海軍編輯部，《近代中國海軍》（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8月）。

¹²⁹ 包遵彭，〈清季海軍經費考實〉，《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1969):17-55；王家儉，〈清季的海軍衙門〉，《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5(1973):109-140。

的成果以爬梳資料，整理列傳的方式進行。但就算是如此，整個淮系集團中的文職、武職、洋員、北洋海軍、李鴻章家族乘員的人脈關係，也漸漸被理出一清楚地脈絡。¹³⁰較為特別的是美籍學者 T.L Kennedy 在 1990 年代初，亦運用此概念專門研究淮系首腦—李鴻章與中國軍火工業的問題。¹³¹筆者近年也注意到湘、淮人事互動對清末臺灣海防的影響，研究發現除中法戰爭期間出現的二劉不合之外，大體而言還能合作共事。這也可以說明臺灣的洋務雖發展較慢，但在較少派系傾軋下反倒可以後來居上。¹³²

在臺灣建省方面，不同於上述幾個議題與清代臺灣的軍事史僅存有間接的關係。該問題的討論在清末臺灣現代化議題中，可說是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並且海峽兩岸的學者均參與其中。而在這當中也有幾個子題是較受人注意。首先是建省決策的討論。臺灣的建省是在光緒十一年中法戰爭後才展開，但其中牽涉到諭令發佈、任官等時間差異的問題等，都是學者有興趣探討的主題。¹³³其次是建省的經費問題。由於臺灣建省之初財源一時困窘，因此最初的五年均要由福建協餉支應。而劉銘傳如何在臺灣廣闢財源，以應付龐大的經費支出更是建省成敗的關鍵。大陸學者吳玫、陳碧笙、鄧孔昭針對此的撰文有精闢的分析。¹³⁴再次是對建

¹³⁰ 陸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團研究——淮軍、淮將和李鴻章》（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年 7 月）；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李鴻章家族成員、武職》（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 12 月）；馬昌華主編，《淮系人物列傳——文職、北洋海軍、洋員》（合肥：黃山書社，1995 年 12 月）。

¹³¹ [美]康念德(Thomas Larew Kennedy)著，楊天宏、陳立等譯，《李鴻章與中國軍事工業現代化(The Arms of Kiangnan: Modernization in the Chinese Ordnance Industry, 1860-1875)》（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 年）。

¹³² 許毓良，〈清末臺灣的海防(1861-1895)——以湘、淮系的人事互動為例〉，《政大史粹》，創刊號(1999):53-80。

¹³³ 黃得時，〈臺北設府與臺灣建省考略〉，《臺灣文獻》，22.4(1971):43-48；王建竹，〈臺灣建省年代與名稱之商榷〉，《臺北文獻》，33(1975):63-64；陳在正，〈臺灣建省方案形成過程的考察〉，《台灣研究十年》（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1 年 11 月），頁 409-440。

¹³⁴ 吳玫，〈劉銘傳在台灣建省後後的財政措施〉，《台灣研究集刊》，1985.3:23-28；陳碧笙，〈從台灣建省背景看劉銘傳改革的成敗〉，《台

省的總論。關於這個方向的討論，早期臺灣學者曾迺碩曾有撰文；1970年代還是研究生的學者張勝彥，即以此為題撰寫其碩士論論文。¹³⁵學者許雪姬把洋務運動與臺灣建省合一討論，則是在這個主題內的一種新的嘗試。¹³⁶

在對外關係方面，臺灣在清末開港對外關係一時顯得熱絡，不過史學界對其研究成果並不多。1960年代學者黃嘉謨利用美國國家檔案局、國會圖書館、各學會等所藏史料，探討十九世紀末美國與臺灣的關係，迄今仍為一上乘的佳作。¹³⁷臺大政治所研究生黃順興，在70年代也以“英國與臺灣”為題撰寫論文；不過該文比較偏向同治九年一大南澳事件前的陳述。¹³⁸較為特殊的是王爾敏從該主題思考，進而討論清末中國與外國在涉外事務上的重要職官—南、北洋大臣的建置，則是該議題上可供參考的作品。¹³⁹

捌、結 語

從上述的內容來看，清代臺灣軍事史的研究成果是豐富而多變。按照本文搜集到的資料，它可以分類成下表：

灣研究集刊》，1987.1:54-58；鄧孔昭，〈台灣建省初期的福建協餉〉，《台灣研究集刊》，1994.4:59-66。

¹³⁵ 曾迺碩，〈福建臺灣之建省〉，《臺灣文獻》，7.3-4(1956):29-50；張勝彥，〈臺灣建省之研究〉，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年6月。

¹³⁶ 許雪姬，〈洋物運動與建省——滿大人最後的二十年〉（臺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1993年3月）。

¹³⁷ 黃嘉謨，〈美國與臺灣——1874至1895〉（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66年2月）。

¹³⁸ 黃順興，〈英國與臺灣1839-1870〉，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76年6月。

¹³⁹ 王爾敏，〈南北洋大臣之建置及其權力之擴張〉，《大陸雜誌》，20.5(1960):152-159。

清代臺灣軍事史相關研究成果表：

研究 成 果 分 類	專 書			單篇文章、期刊		
	臺灣	大陸	外文	臺灣	大陸	外文
軍事史界說的問題	13	9	2	33	16	3
軍事史與戰爭史的關係	3	0	0	21	11	2
軍事史與聚落史的關係	4	0	0	38	0	1
軍事史與交通史的關係	2	4	0	10	3	2
軍事史與社會史的關係	3	2	1	23	2	2
清末現代化研究下的臺灣軍事史	7	9	1	19	8	0
小 計	29	24	4	144	40	10

計算這些成果包括：專書 57 冊、單篇文章或期刊 194 篇、論文 25 本，整體而言數量不可謂不多。但從臺灣、大陸、外國(外文)各不同學者群的專長比較，彼此還是有擅長或較弱的地方。其一，外文著作佔有絕對的少量則是一開始就提及，不過在軍事與社會史研究相關的專書方面，其比例 3:2:1 的差距尚不至於過大。其二，清代臺灣軍事史的研究，仍以臺灣學者群的成果最豐，這從專書、單篇文章或期刊所佔的壓倒性數目可見一般，其中又以軍事與聚落史的研究兩岸差距最大。其三，大陸學者在部分研究領域中，也有相對性的優勢。例如：在軍事與交通史、現代化研究下的專書數目中，則很明顯地超越臺灣學者。而大陸學者在某些議題，例如：海洋交通史、淮系集團、北洋艦隊、會黨研究等也有不錯的表現。

當然本文所收集到的資料誠屬有限，並且多以臺灣地區所能找尋到的資料為主(例如：學位論文則清一色都是臺灣)。但經過本文仔細的鋪陳後，所增加或新添的資料應都屬於本文討論的範圍。而就如同臺灣史的其他研究領域一般，清代臺灣的軍事史其實仍有許多拓展的空間，如此的目標還有待於後繼者逐一完成。